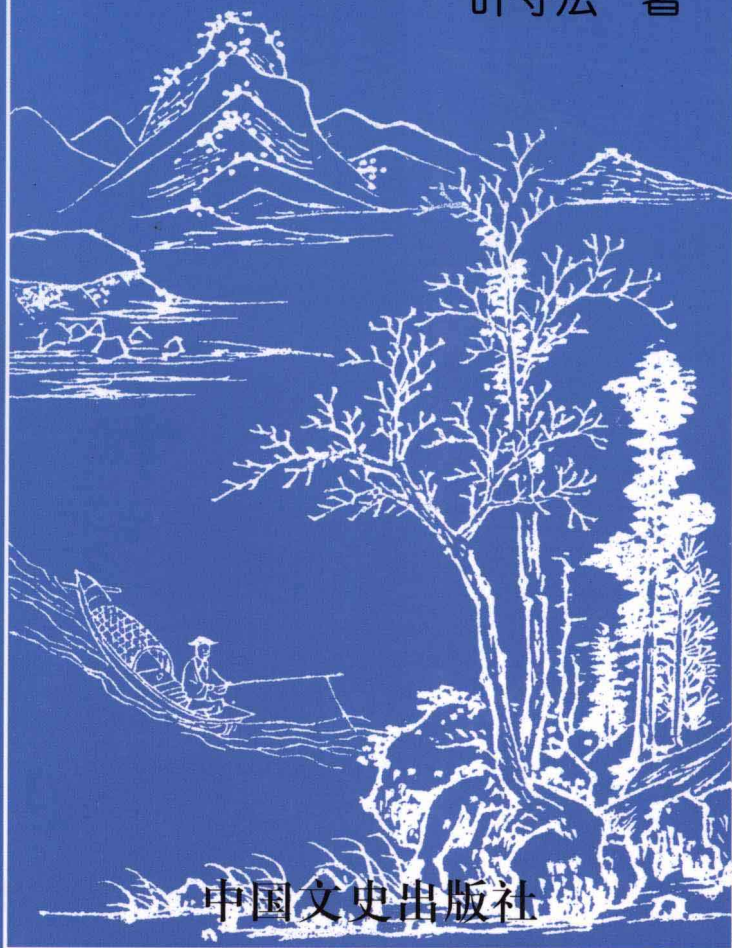


书海游记

叶守法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书海游记

叶守法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海游记 / 叶守法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7-5034-1234-8

I. 书… II. 叶… III. 文献 - 图书 - 研究

IV. Z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 / 32

印 张: 6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14.6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私人藏书·····	(1)
书与朱元璋·····	(17)
中外禁书比较·····	(24)
《四库全书》·····	(32)
《四库全书总目》的功绩·····	(44)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53)
《四库全书》与《永乐大典》的比较·····	(71)
中国古代书院的社会地位·····	(78)
文献·····	(89)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96)
高校图书馆对学生爱护书刊的教育·····	(103)
高校视听教育·····	(111)
院校合并后的图书馆·····	(117)
图书馆的数据库·····	(124)
中国高校数字化图书馆·····	(130)
21 世纪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采编·····	(136)
西部大开发与图书馆计算机网络建设·····	(142)
高师教学评估与图书馆·····	(145)

私人藏书

古往今来,各朝各代、各个地区,都有不少人特别喜爱藏书。有些人把藏书看的比收藏金银、珠宝还重要;也有些人为了藏书,挥金如土,导致家境贫寒、衣食不足;还有些人爱书胜过生命,甘愿冒生命危险去藏书。认真分析、研究这些现象,从中探求有益的奥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私人藏书的原因

人们积极的、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藏书,原因是什么?这只要弄清书及其功能是什么,就会明白。有人说书是知识的载体,也有人说是知识的源泉,还有说是知识的结晶,又有说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又还有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少的人则有更加形象具体的说法。有的说书是文明的象征、护身的宝剑、心灵的明灯、道德的典范、邪恶的克星、旅途的伴侣、孤独的亲朋,书能给家庭增添温暖、使病人减轻苦痛,书是青年的益师良友、老人的保健医生,书对好学者忠诚不二、对善思者唯命是听,书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能驱走黑暗、能迎来光明、能授业解惑、能传道启蒙,书可化险为夷、能转败为胜,书是造就人才的伟大工具、继往开来的万有宝库、价值连城。还有的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也有的说书中自有情与理,书中自有天与地。又有的说,只要有书,地球毁灭了,还可以再造等等。这些当代的、古代的、国内的、国外的名人,把书看成无所不有、无所不能,即是私人藏书的根本原因。

二、私人藏书的产生和发展

私人藏书应追溯到文字的产生。有了文字,就可能有书及私人藏书。

关于文字的产生,在我国,有些人说字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韩非子·五蠹》中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有些说的还十分神奇。《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也有些人说,文字是人们共同创造的。《荀子·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到底哪种说法准确,想判断清楚,极为不易。所以,要准确说明私人藏书起于何时,何人所藏,藏的何书,就更困难了。到目前为止的各种说法,仅仅都是推测而已,都无确切的依据。但据史料可以推断,私人藏书的时间,不会迟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度期。春秋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步瓦解和封建制度的逐步建立,产生了“私学”和“私人讲学”。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孔子,先后收弟子 3000 名。担任私学的教师和参加私学的学生,要想教好或学好,必然拥有私人藏书。仅此,即可表明这一时期不仅有私人藏书,而且私人藏书也绝非一家,私人藏书已经明朗化。《墨子》中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进一步说明了藏书人数和藏书量在当时都不少了。因私学和私人讲学之风的兴起,又先后产生了老子、墨子、庄周、荀子、韩非等学派及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学派思想和学派之争,不同学派的理论著作也相继问世,供私学弟子们学习、传播、收藏等,仅孔子一人就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著作传给弟子。公元前 213 年,为了消除学派之争,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将医药、卜筮、种树、法之外的《诗》、《书》、百家语、非秦记之书尽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冒杀头之危拒不焚烧,而且藏得

更加隐蔽,有的移入山洞中,有的移入墙壁里。《家语》中云:“孔腾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论语》、《孝经》于夫子堂壁中”。《尚书正义·卷一》中说:“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这些说明,秦朝时期,私人藏书,在人数、书的种数和册数上,都有了一定的量。汉初,刘邦口头上说要废除秦代的各种法令,但仍视私人藏书为违法行为,可是没有认真去抓。故私人藏书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汉惠帝执政,下令解除私人藏书禁令,私人藏书活动得以公开进行,私人藏书得以发展。西汉末年,出现了类似今天图书买卖市场的“书肆”。更加有力地促进了私人藏书。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藏书大户,有些还成了著名的私人藏书家。魏:王修家藏书数百卷,王弼家藏近万卷。两晋的张华,家藏三十乘。南北朝的谢弘微、刘善明、沈麟士等,都是藏书名家,有的家藏万卷以上。

隋唐时期,私人藏书迅速发展,名藏家不断出现,藏书量大增。《新唐书·苏弁传》中说,苏弁“聚书二万卷”。《新唐书·王涯传》中称,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新唐书·韦述传》中说,韦述家“聚书二万卷”。《新唐书·张弘靖传》中记,张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另外还有韩王李元嘉、魏征、元行冲、李范、吴兢、蒋义、韦处厚、李冲、田弘正等都相继成了藏书名家。唐之前的隋朝许善心、明克让、陆爽、张琬等都先后成了著名的藏书家。

宋元两朝,私人藏书大发展,新的藏书家大量出现,藏书量也令人惊奇。《宋史》称,赵州的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王钦臣家藏四万三千卷,而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之类的书还不包括在内;江南人江正拥书数万卷。还有司马光、王溥、李昉、李淑、刘恕、晁说之等人藏书也都极有名望。元代人藏书量更大。松江人庄肃藏书八万卷,经史子集诸书皆备;奉元人周恕藏书达数万卷;华亭人孙道明、无锡人倪瓒、蒙古人阔里古期等藏书都很多。

明清二代,私人藏书进入顶盛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藏书大户

和特大户。《二酉山房记》中说,明代胡应麟,家中拥书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周定王六世孙朱睦㮮家中藏书五万卷,兵部右侍郎范钦家中藏书七万卷以上,郑澗、毛晋、祁承燦等都在八万卷或八万卷以上。清代的瞿启甲藏书十万余卷,陆心源十五万卷,杨绍和家达二十万余卷,均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型图书馆的藏书量。

清代以后,私人藏书继续发展,藏书的人越来越多。突出的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私人藏书急剧增加。上海青浦县朱角镇 5200 多户居民中,藏书户现已发展到了一半以上;年近 70 岁的退休工人周陀兴,为了省钱买书,把烟戒了,烟钱用于购书,现已收藏 3400 册《史记》、《三国志》等书;工人陈学余拥书 2800 册;会计苗中英藏书 2000 册;教师钟铁军收藏 3000 册,王海波 2900 册;全镇私人藏书已达 10 万余册。私人藏书的快速发展不仅表现在城镇,而且早已深入到乡村。湖北省有一个农村,已成为藏书村,村中不少人家都藏有古籍线装书。在全国各地,又出现了不少的很有名望的藏书家,藏书都较多、质量较高。著名学者、诗人何其芳,家中藏书“整整放置一两个房间”;中国法学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田涛,家藏古籍书五万余册,其中有不少是珍本、善本、孤本图书,令人赞叹。

三、私人藏书的书之来源

书源,是私人藏书的基础。没有书源,私人藏书则无从产生和发展。从史料上的信息和现实情况看,私人藏书的书之来源是多方面、多渠道的。但主要来源以下几个方面:

1. 刻印抄录

刻印抄录是私人藏书的一种好方法。这种方法虽费精神,但不会影响别人的使用和收藏。若是自己刻写抄录,既能增强对所刻写抄录内容的记忆,还能节约不少资金,对家境贫寒之人尤为重要。

私人刻印抄录书籍,历代都有,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难以计数。《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之,留其真,加锦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南史·沈麟士传》中说,“南齐人沈麟士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后来其典藏遭火,烧书数千卷,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南史·袁峻传》中说,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魏书·李彪传》中说,魏时高悦之兄高间,博学高才,家富典籍,于是“(李)彪遂于悦家抄口诵,不暇寝食”,以私藏。《北齐书·祖珽传》记,北齐人襄家多集书之人,常常诡称买书,将书挟回家中“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周书·裴汉传》记,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明代吴郡袁袞嘉趣堂,刻书多而精,先以仿宋张之纲本《文选注》六十卷,为当时之代表,据袁氏书跋称,“余家藏书百年,此本甚称精善,因命工雕梓匡郭字体未少改易,计十六载而完”。明代毛晋,既是藏书家,刻书也极有盛名,四十余年刻书六百多种,其中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说文解字》等为最好,世称“毛刻本”或“汲古阁本”。有不少的刻书家,也都成了有名的藏书家。

2. 购买

一般的说,家资富有者所藏的书籍中,以购买得来的较多。毛晋是明代晚期乡村地主,他家的藏书不仅来源于刻印抄录,而且还来源于购买。史记,毛晋为了收罗宋元名刻秘钞和当代文献,榜示于门外曰:“有以宋槧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而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毛晋收书达八万四千册”。范钦家藏的七万余卷书中,有不少是购买浙东丰道生万卷楼的藏书。清代的顾之逵,倾尽家资买书,藏书

多,专门设置藏书处,史称“小读书堆”,有“黄金散尽为收书,秘本时时出老屋”之誉。

3. 前代遗传

前代遗传是私人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少藏书家都有上一代或几代人的藏书。私人藏书量的急增,也往往来源于前代的遗传。一是遗传下来的书一般都有保存价值,有些还很珍贵;二是遗传有时数量大,少则数百册,多则数千册,甚至有的可达数万册,不需资金购买,只要有个地方存放便可,易于承受。东汉蔡邕,家藏丰富,汉末载数车与王粲,王粲的藏书又为其子继承,后王粲之子被诛,其书悉归族兄王凯之子王业,从汉至魏,世世相传。南齐人褚渊之父褚湛之私藏图书甚丰,死后,其子褚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前代遗传藏书,各个时期都有,有的时期多些,有的时期少些。

4. 赠送

赠送书,是社会风气好的一种表现。它不仅能促进人对文化知识的学习研究,把握人生的方向,而且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对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能起到纽带作用。赠送书,本身包含着对受赠人的友情与希望、关怀和期待,十分珍重。有时一本好书,能改变人的一生,胜似万两黄金,历代的收藏家都非常珍视对赠书的收藏。南宋名藏家晁公武具有代表性。他收藏的二万四千五百多卷书中,有井度的赠书五十篋。当代赠书的人数增多,尤其是有名望的作家之间,已把书当作礼品,而且有些人已把书当作最贵重的礼品。

5. 赏赐

赏赐的书,通常都很珍贵,私藏家非常喜爱。赏赐书,各个时代都有,有的时代比较多。《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蔡文姬藏其父“赐书四千余卷”。《魏书·太祖武帝纪》中说,北魏初,太祖与贺麟的战斗中“获其所传皇帝……图书……簿列数万”,“班赐功臣及将

士各有差”。《陈书·江总传》记,陈江总“家传赐书数千卷”,数量可观。清代乾隆年间浙江的鲍士恭、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璥、范懋柱、汪启淑,两淮的马裕,江苏的周厚堉、蒋曾莹,以及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藏书家,均因修《四库全书》而献书较多,分别得到皇帝赏给“古今图书集成”或“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都是难得的好书。

6. 来源于战乱

从整体上说,战乱给国家、个人都会造成损失。但从局部上看,有时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收藏图书也不例外,有的失去,有的得到。《萧相国世家》中记,公元206年冬10月,刘邦兵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锦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晋书·应詹传》中说,晋人应詹与陶侃在长沙打败了杜弢,杜弢库中金宝溢目,而詹无所取,唯收图书,莫不欢之”。《北齐书·辛术传》中说,北齐人辛术是一个“虽在戍族,手不释卷”的人,“及向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以下法书数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门”。清代浙江钱塘人丁丙,家藏书中有3500余部是1861年战乱得“文澜阁”的“失劫书”。

四、私人藏书特点

私人藏书同国家藏书有相似之处,然而,由于收藏的目的差异较大,故收藏特点各不相同。私人藏书的主要特点是:

1. 注重收藏珍、善、孤本

珍、善、孤本,是难得的收藏资料。其所附载的内容,是研究社会、研究历史、改变现状、探讨未来的重要信息,国家十分重视收集。但国家为了满足全社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爱好人员的各种需要,还要大量收藏其它书籍。而私人收藏则不一样。由于个人的精力、财力、物力、价值观念等原因,不少人

往往只收藏或基本上只收藏珍、善、孤本书籍。《晋书·张华传》中记,“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清朝吴县收藏家袁廷桢,也可算作一位代表,家“藏书万卷,皆宋槧元刻,秘籍精钞”。

2. 注重收藏名人著作、优秀作品

名人著作、优秀作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些名人著作或优秀作品自问世以来,阅读者不断,有的百读不厌。这些名著、优秀作品,鼓舞、激励、指导着人们奋发、向上、前进,不断地产生强大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因此,一些人只收藏或基本上只收藏名人著作、优秀作品。

3. 注重收藏一类、一个时代,几类或几个时代的书籍,向专门化方向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学科不断出现,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越来越多,书籍种类在大量增加。面对这种形势,任何一名书籍收藏家,想全面收藏各个学科的书籍,是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向专的方向发展,已为历代私人藏书家所关注,越来越多的人由全面的收藏各类书籍逐渐转向专门收藏最喜爱的某一类、一个时期、一个时代,几类或几个时代的书。《魏书·李业传》中记,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新唐书·颜师古传》记,颜师古“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新唐书·张弘靖传》记,张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宋史》记,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为唐人诗集著名。司马光拥书万余卷,多为文史。南宋无锡人尤袤,注重对各种版本图书的收藏。他收藏的版本有旧本、旧监本、秘阁本、京本、旧杭本、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江西本、吉州本、池州本、湖北本、川本大字本、川本小字本、成都石刻本等。古代,搞专门收藏的代表很多,现代的更多。具有现代文学家、史学家兼作家之称的唐弢,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专门收藏有关资料,家中藏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到解放初期的各种珍贵的中

国文学史料。

五、私人藏书对社会的贡献

私人藏书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无法估量的,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保存了文化遗产,指导着人类事业的发展

翻开历史,不难看出,在漫长的岁月里,书籍曾遭受过难以数尽的灾难。据史料粗略统计,从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秦孝公到清代德宗的二千二百多年里,先后有秦、西汉、西晋、后赵、前秦、北魏、北周、南朝、梁、后周、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十七个王朝五十位皇帝(不含太平天国)一百二十三次下令搜查、火烧、毁弃、禁止收藏六国史、野史、私史、史鉴、传记、佛、经、天文、历法、兵法、书法、诗歌、小说、戏曲等类共六千余种书籍(不含因无子目可考的元代禁毁的《道藏经》、《玄都宝藏》七千余帙等)。历史上的皇帝们到底禁毁了多少种、多少卷书,现已无法查清。但可以推算,数量是不少的。仅清乾隆三十七至五十三年,就下令烧毁的图书达七十至一百万册(卷)。尽管这是皇帝们的命令,但不少的人还是没有执行、或没有完全执行,而是冒着杀头、诛连九族之危险,将一些书籍藏到更隐蔽的地方,保存了下来。从现有的图书看来,在被禁毁的书中,通过私藏保存下来的数量还是可观的,仅“天一阁”就收集私人所藏的珍、善、孤本图书八千余卷。私藏的兵法、战策、史籍、文学、天文、历法等书,对今天乃至今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都仍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早期下令禁毁的《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和晚期下令禁毁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不朽名著,已被有些国家、地区、行业、大商人、企业家、文学家等视为不可多得的经典资料,大力收集、传抄、翻印、学习、领会,用其精神指导发展各自的事业,不少的单位或个人已经获得辉煌成果。

2. 补充了国家藏书

书籍在历史上遭难,不仅表现在几十位皇帝查抄禁毁上,突出的还表现在战乱、水灾、火灾上。这方面损失严重的起于春秋到秦朝末年的战乱。这一时期不断地争斗和秦国火烧六国史,至汉朝建立时,国家藏书几乎损失殆尽,已经到了因缺乏书籍,皇帝不得不动员秦代老博士背诵旧典、笔录成新书,以应教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使用的境地。为补充国家藏书,从汉武帝开始,鼓励私人向国家献书,刘歆的《七略》记载,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仅著录于《七略》的私人藏书就达六百余家、一万三千三百余卷,《隋志》称“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后人说不准确。《隋书·牛弘传》中说,“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顾也”。这个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当时宫室藏书确实剩下不多了;被刘秀搬到洛阳后,私人继续献书,国家藏书又逐渐丰富起来。东汉末年,争战再起,书籍第三次遭受大难。《后汉书·儒林传》中说,汉献帝由洛阳往长安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滕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王允在搬运的路上,又“复弃其半数”。《隋书》称这次战乱,使长安和洛阳的图书“扫地皆尽”。事实上,汉代近四百年积累的书籍,经这次战乱,已所剩无几。魏晋时期,私人不断献书,战争也连续不断,形成了损失一次,补充一次,不断损失,不断补充的循环状态。这样国家的藏书虽然难以恢复到汉代的规模,但始终储存了不少的书。可惜的是,到了梁朝的武帝时期,发生了“侯景之乱”、洗劫金陵、东宫起火事件。《太平御览》中说,这次“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之后,私人献书补充,国藏又不断丰富。至梁元帝时期的争战,江陵被攻破,梁元帝怕书籍被敌人所获,“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书·经籍志》)使一度兴起的国家藏书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这样,献书

不止,争战不息,损失了又补,补充了再失,到隋朝建立时,国家藏书只有一万五千余卷。为了加快补充国家藏书,隋朝对献异本之书,实行抄录后归还,并按一卷书另赏献书者一匹绢作为报酬的政策。献书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有异本书者陆续献出,国家藏书急增。《新唐书·艺文志》中说,至隋炀帝即位不久,嘉则殿书增到三十七万卷,创历史上国家藏书最高记录。当然,这不仅仅是献书之功,还与当时的大量抄写有很大关系,有些书抄写的复本量高达五十。不幸的是,后来的战争中,又有巨大损失。进入武德初年,隋嘉则殿三十七万卷书,只剩下八万卷。《隋书·经籍志》中说,武德四年,李渊战胜王世充后,将隋东都洛阳的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到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之后,私人献书补充,一度达到二十余万卷。安史之乱,损失惨重。《旧唐书·经籍志》中说,“乾元旧籍”、“尺简不藏”。及至宋朝初年,国家仅有藏书万余卷。宋皇帝十分着急,在前朝的基础上,再一次加大对私人献书的刺激力度,规定,所献之书是国家无有的,抄录后归还,并将献书者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官职者俱以名闻。若献之书是珍本,即命以官、议加重奖等。此法收效很大,私人献书热再度兴起。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三人献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并赐科名。张颐献书二百二十一卷,李东献书一百六十二卷,均系阙书,二人皆得赏赐,张赐进士出身,李补迪功郎。到开宝年间,国家藏书已增至八万余卷。但好景不长,战争又起,北宋灭亡时,《宋史·艺文志》中说,“馆阁之储,荡然靡遗”。明清两代私藏家献书很多。仅被称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就献出了家藏的元刻本一百四十余种及明刻精本、旧抄善本、著述稿本、校讎秘册约二千余种和“文澜阁”著录之书三千五百余部,总计八千卷。必须说明的是,明清两代国家的藏书损失也极为惨重。北京文源阁、浙江的文宗阁和文汇阁所藏图书均被战火焚毁,三阁中所藏的《四库全书》内收录的图书就达三千四百

七十种,总计二十三万七千零五十四卷;同时,北京翰林院内《四库全书》底本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也散失已尽、荡然无存;其它地方的藏书被毁也不少。由于私人藏书不同于国家,规模不大,多的不过二十多万卷,一般的仅有数万或数千卷,少的只有数百或数十卷,有些甚至还少些,且分散于各地,受到水灾、火灾、战乱等,转移方便,不会同时毁灭。因此,国家历史上藏书一次复一次的遭到巨大损失,乃至灭顶之灾时,私人仍然有书不断地供给国家抄录、复制、使用、存储。

3. 提高了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急需的专门人才

书籍是记载、传播人类思想修养、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人们通过收集、翻阅、鉴别、分类、整理、储存、研究书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书中不断地学到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修养。有些私人藏书家不仅利用家藏书籍从事学习与研究,而且还将私藏书籍向社会开放,提供给无力藏书或不藏书的人们学习、使用。有些还利用家藏书籍从事教育,培养他人成才。《三国志·蜀书·向朗传》记,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晋书·范平传》记,晋人范平之子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南史·崔慰祖传》记,南齐人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北宋时期的李公择,建昌(今四川西昌)人,聚书九千余卷,藏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以供人用。这些私藏书籍,使难以计数的人们不断地提高了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同时还哺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拔尖人才。历代通过科举制度成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进士、举人、秀才的,除了从老师或国家藏书中学到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外,无一不是靠私人藏书的营养而成功的。科举考试选出的拔尖人才相当多,仅明清

两代先后进行的二百零一科考试中,就有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人分别成为状元、榜眼、探花、二三甲进士等。用科举考试选出的人才,绝大部分都成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中的骨干。历史上还有不少没成名、或成名后再通过对私人藏书的学习与研究,进而不断地获得新的成果,从而又成为有关方面的专家的。汉代刘向、刘歆就是典型代表。《汉书·楚元王传》中记,刘向“精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利用家藏书籍和当朝“文中大夫卜圭”、“富参”、“射声校尉立”等私人藏书为国校勘民间献上的经传、诸子诗赋等,校后为各书撰写题解,汇成《别录》,不久其子刘歆也参与此事,且依据《别录》编撰《七略》,首开目录学、校雠学之先河,一举成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家、校雠学家、题解专家。类似的典型很多。南宋时期的晁公武,《群斋读书志序》中说,晁公武对家藏的二万余卷书,“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合为《群斋读书志》,成为一部著名的提要目录;南宋尤袤,对家藏书籍进行目录编制,并在目录中著录各书是何版本,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成了一大创举;南宋郑樵,对所藏的数千卷书,亲手校雠,并研究撰成巨著《通志》,还在《通志》中设《校雠略》,提出了系统的目录学理论;这三人的学术理论对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利用私藏书籍学习研究获得很大成果而出名的,各个朝代都有一大批。清代的钱曾、黄宗羲、陆心源等都是典型的代表。陆心源利用家藏书籍、著书九百四十卷,汇成《潜园总集》,可以说是一位高产作家;黄宗羲“穷经究史,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充分阅读研究家中藏书,不断地编纂写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钱曾刻苦读研家中藏书,“二十年食不甘味,衣不完彩,屏当家资,悉于典籍中,编成《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撰《读书敏求记》,是著名的解题目录,对有关方面的学习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代利用私藏书籍学习研究而成名的更多,上海市青浦县朱角镇就有一名代表,名叫冯煜,利用所藏纺织方面